

吾家小史

余秋雨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014037305

I267
2692
2014

吾家小史

余秋雨

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北航

C1725564

I267
2692
2014

新出图证(鄂)字0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吾家小史/余秋雨著. —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4.5

ISBN 978-7-5354-4942-9

I. ①吾… II. ①余… III. ①余秋雨—回忆录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43325号

责任编辑: 吴双 王慧敏

装帧设计: 朝霞

出版: 长江出版传媒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
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(电话: 010-83670231)

http: //www.cjlap.com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开本: 690毫米 × 980毫米 1/16

印张: 22

版次: 2014年5月第1版

2014年5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 253千字

定价: 38.00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联系010-83670231进行调换)

南炳余

长期担任河南省政协、河南省文史“室”主任、副主任。一九八四年四月至一九八七年，任湖北大学《中国史系》主任兼系主任，任系主任期间曾于南京城



、中大任职，中大正州府干，中大发展，中大革命军活动，去年二〇〇二年的“外望果甜”，“支持，陈玉华”外委会中国中组会，任中国全国政协原台台委黄正市南王，年八〇〇二，中大大学学教授水等，任委员“升文中国风教育”，外委“外委南炳”南炳南王南炳南王，任市王南炳南炳余，任南炳（南炳），并任南炳南王入中大中林门等，任南炳南炳南王南

余秋雨

一九四六年八月生，浙江人。早在“文革”灾难时期，针对当时以戏剧为起点的文化极端主义专制，勇敢地建立了《世界戏剧学》的宏大构架。灾难方过，及时出版，至今三十余年仍是这一领域唯一的权威教材，获“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”。同时，又以文化人类学的高度完成了全新的《中国戏剧史》，以接受美学的高度完成了国内首部《观众心理学》，并创建了自成体系的《艺术创造学》，皆获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被推举为当时中国内地最年轻的高校校长，并出任上海市中文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，兼艺术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。曾获“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”、“上海十大高教精英”、“中国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”等荣誉称号。

二十多年前毅然辞去一切行政职务和高位任命，孤身一人寻访中华文明被埋没的重要遗址。所写作品，既大力推动了文物保护，又开创了“文化大散文”的一代文体，模仿者众多。

二十世纪末，冒着生命危险贴地穿越数万公里考察了巴比伦文明、埃及文明、克里特文明、希伯来文明、阿拉伯文明、印度文明、波斯文明等一系列最重要的文化遗迹。作为迄今全球唯一完成全部现场抵达的人文学者，一路上对当代世界文明作出了全新思考和紧迫提醒，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。

他所写的书籍，长期位居全球华文书排行榜前列。仅在台湾一地，就囊括了白金作家奖、桂冠文学家奖、读书人最佳书奖、金石堂最有影响力书奖等一系列重大奖项。

近十年来，他凭借着考察和研究的宏大资源，投入对中国文脉、中国美学、中国人格的系统著述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、北京大学、《中华英才》杂志等机构一再为他颁奖，表彰他“把深入研究、亲临考察、有效传播三方面合于一体”，是“文采、学问、哲思、演讲皆臻高位的当代巨匠”。

自二〇〇二年起，赴美国哈佛大学、耶鲁大学、哥伦比亚大学、纽约大学、华盛顿国会图书馆、联合国中国书会讲授“中华宏观文化史”、“世界坐标下的中国文化”等课题，每次都掀起极大反响。二〇〇八年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颁授成立“余秋雨大师工作室”。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“秋雨书院”院长、香港凤凰卫视首席文化顾问、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。（陈羽）

自序

中国文化有很多优点，也有很多毛病。毛病中最让我感到痛切的，是它纵容谣言。

在《何谓文化》一书中，我曾用八个押韵的短句概括过谣言在中国的优惠待遇：

造谣无责，
传谣无阻；
中谣无助，
辟谣无路；
驳谣无效，
破谣无趣；
老谣方去，

新谣无数。

不少上了年纪的读者告诉我，这几句话他们已经能背诵了，因为实情确实如此。只要是中国人，一读就能会心微笑。

但是我必须指出，当这种实情充分展开的时候，受害者的遭遇极为可怖。几千年来不知有多少气吞山河的将军、贤臣、诗人、智者未得善终，细细追索悲剧的成因，最后总会找到几句关键谣言。

“青史因高尚而立，高尚因谣诼而溃。”在我看来，这就是中国历史步履蹒跚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且不说古老的血迹、邻家的悲泣了，就以我自己家里为例吧，谣言之祸害，刻骨铭心。

我叔叔在“文革”中自杀，就因为几句辩不清的谣言。我爸爸被关押十年，也因为几句辩不清的谣言。他们两人一死一关，我家经济来源断绝，老老少少八口人饥寒交迫、生死挣扎，就是因为那几句谣言。

叔叔刚烈，决心以生命的代价让“革命群众”明白，那些都是谣言。但他一死，“革命群众”齐声说，他是“畏罪自杀”。他们让他的鲜血，加固了谣言。

爸爸老实，原来也想自杀，却又考虑到全家生计而活了下来，天天在歹徒们的暴虐中撰写长文来反驳谣言。这种长文，他连续写了十年，还用蓝印复写纸誊抄，一手擦泪一手执笔，直到眼睛几乎失明。因此有时，经造反派当权者批准，由他口述，由我记录，一份份往上送。但事实证明，这些堆积如山的长文，并没有反驳掉任何一条谣言。

叔叔和爸爸后来在名义上都已“平反”。他们墓头的草树，枯了又青，青了又枯，不知多少年了，但是直到今天，我还不知道当初的造

谣者是谁。

叔叔和爸爸是社会最底层的小职员，连个“副科级干部”都挨不上。当时，比他们高得多的人物，直到国家主席、学术权威、艺术大师，全被谣言困住了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当时社会上的每一个单位，都发生了“谣言井喷”，几乎一切稍稍像样的人都成了叛徒、特务、汉奸、坏分子，而且都有大量“细节”、大批“证人”。于是，全国几百万个“专案组”为这些谣言而设立，一设十年，却没有一个专案组破除过一个谣言。这么大的数量，这么长的时间，实在是人类史上的奇观。

造成这种现象，除了从上而下的政治背景外，更由于从下而上的文化土壤。

政治背景容易更替，文化土壤很难改变。

一些民众喜欢谣言、企盼谣言、参与谣言、庇护谣言，已经成为一种“集体无意识”，也就是集体文化本能。结果，造谣在中国，变成了一种既安全又显赫的群体职业。在这一点上，我对中国“国民性”的评判，比鲁迅更为严厉。原因是，鲁迅没有遭遇过那么多运动，那么多民粹，那么多谣言，那么多灾难。

二

我原以为，经历过“文革”，中国人对谣言的癖好也许会稍稍减轻一点。后来发现，完全不是这样。

“文革”的谣言只由大字报传播，而现在，谣言凭借着网络和传媒，可以顷刻笼罩万里江山。一次次以谣言为基础的群体投注，使一个民

族的心理底线因过度消耗而日渐脆弱。那些造谣者，更是具有了呼风唤雨的号召力，远远超越他们的前辈，或他们自己的前半辈子。

中国古人说：“谣言止于智者。”这其实只是一个空洞的自我期许，而不是社会真相。因为智者未必是仁者，仁者未必是勇者，不存在阻止谣言的道义和胆气。相反，他们的智商很可能成为谣言的动力，使谣言更精致、更耸动、更有传播力。因此，无数历史事实证明，“谣言止于智者”这句话，本身就是一个谣言。

我相信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，少数谣言有可能被阻止。但在整体上，我们对谣言基本上无能为力。

谣言在什么时候又会快速点燃人们的轻信、无知而酿发新的破坏性运动，搅起新的社会灾难？几乎难于避免，而且难于预测。在如此无奈中，我能做的，仅仅是记取自己叔叔和爸爸的惨痛教训，那就是：不像叔叔那样为谣言自戕，不像爸爸那样与谣言争辩。

我从父辈身上获得的这两大教训，可能是世间对谣言最明智的认识。

似乎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要考验这种最明智的认识，居然，我本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谣言狂潮。

为什么说“前所未有”？只要与叔叔、爸爸的遭遇一对比，就能明白。

第一，叔叔遭受谣言攻击，半年就自杀了，爸爸则被谣言闷住了十年。而我，已被谣言包围了二十年，等于又经历了两场完整的“文革”；

第二，叔叔、爸爸所遭受的谣言攻击，主要集中在本单位，没有报刊参与。而对我，除了本单位没有参与外，全国一百六十余家报刊都参与了。其中南方一家著名报纸主导了每一场谣言围攻，覆盖面之大无与伦比，且被海外华文报刊广泛转载；

第三，叔叔、爸爸所遭受的谣言攻击，内容比较固定，两三项诬陷而已，而我遭受的攻击，范围漫无边际。从所谓“文革历史”、“文史差错”、“文化口红”、“地震捐款”、“阻止请愿”到“深圳赠房”、“遗产大会”、“美女作家”、“离婚声明”等等，面面俱到，与时俱进；

第四，叔叔、爸爸所遭受的谣言攻击，主要来自不知法律为何物的造反派歹徒，具有暴烈性却不具有权威性。而围攻我的那么多传媒和打手，几乎都在炫耀权势，标榜背景，展示团队、高谈法律，让谣言披上了足以霸凌一切的行政胄甲；

第五，叔叔、爸爸遭受的谣言攻击，从现存的材料看，发动者文化程度很低，只知摆弄极左口号。而攻击我的造谣者，却擅长笔墨，会编故事，懂得版面，巧言令色，有煽动性。

——仅此五点，我就有信心对叔叔、爸爸说：“千乘万骑，久围一人，比之父辈，纵亡无恨！”

但实际上，我还是有“恨”的。当然不是恨那些造谣者，他们不值得恨，就像我们不会去恨蛇蝎，只会去恨那些欣赏蛇蝎伤人的人。

那么，我究竟恨什么呢？

在“文革”中我就很惊讶，当一个歹徒喊出口号要“打倒”某个教授时，绝大多数民众的眼睛都会直视那个教授，欣赏他的惊讶、委屈、气愤、失措，而不会回过头来看看，喊口号的歹徒是谁。也会有几个人回头，但那只是好奇和怂恿。过一会儿，“打倒”改成了“吊死”，大家仍然欣赏那个教授的恐惧表情，还是很少有人会回头看歹徒一眼。

我最恨的，就是民众的这种目光走向。

我在遭受每一次谣言攻击时，一开始总想告诉民众，这是假的。但很快发现，大家都知道这是假的，或者不在乎真假，只等待我的狼

狈，我的慌张，我的失态。我原来抱怨，大家怎么都成了旁观者？后来发现，根本不是旁观者。因为旁观者是中立的，他们绝不中立。如果中立，就不会有我爸爸的十年，我的二十年。

我等待过，不是等待歹徒消失，而是等待民众的目光能投向歹徒。但是，等了那么久，我等不到了。

我非常失望。因为我是一个历尽艰险寻找民族尊严的人，一个走遍世界阐释中华文化的人，但每次回来，总是谣言、谣言、谣言，而且越来越污浊，越来越肮脏，越来越嚣张，越来越盛大。当然耳边也会听到一些同情的低语，却永远缺少真正的帮助。

我一直企图说服自己，这种现象与我所钟爱的脚下的土地无关。但是，所有的事实告诉我，不是无关，而是有关。

我终于明白了杨长勋教授对我的告诫：赶快离开。但是，我和马兰，都有年迈的父母亲需要照顾。

正这么想着，我爸爸，却被攻击我的谣言气死了。他的死，也有医学上的病因，但不能排除他临终床头的那三份报刊。一份广州的，一份天津的，一份上海的，对他造成了最后残害。

这些报刊在造我的谣，而这些谣言使爸爸联想到了我家在“文革”中的悲惨经历。一种巨大的逆反，让老人家痛彻心肺。这位抗拒了十年谣言而获得过胜利的英勇老将，终于牺牲，为了他的儿子。

对这件事，我写道：

我是一个博爱主义者，常常对那些严重伤害过自己的人予以原谅；但我又是一个中国人，终身不会淡忘“杀父之仇”。我即使把“必要仇恨”缩得再小，也会永远记得爸爸临终床边放着的那

些报刊，以及报刊背后那几个人。

博爱使我容光焕发，仇恨使我双目炯炯。

我的宗教情怀反对我报仇，却不反对我出走。前思后想，觉得我们夫妻两人也算非常对得起这片土地了，只是年纪已大，很想避开歹徒们的惦记，寻个安全，因此即使远离，也已无须汗颜。但是，歹徒们的势力范围很大，欺骗领域更大，欧美很多大城市的华文圈都已有他们的阴影，我们只能敬鬼神而远之。我和马兰讨论过塞浦路斯、以色列、南非，而在这本书的最后，则指向了西太平洋的密克罗尼西亚群岛。

那里有可能是几千年前河姆渡文化或良渚文化湮灭时的先民逃生处，因此也可以看成是远祖的家园。在密克罗尼西亚，我们特别羡慕那对在海上航行了整整二十五年，从未上岸栖宿的夫妻，那位妻子还是中国人。但是，看来只能羡慕了，我们已经没有那么多精力。

当然，不管到哪里，还是阐扬中华文化。可以想象在那个归息之地，我展卷而叹，抚伤而忆。而马兰，则拭泪而歌，仰天而吟。

三

临了，还要以这本书的名义，对谣言表示感谢。

谣言也有正面意义，那就是，让我们在内心确认真实之为真实。

因为有那么多虚假，真实就显得更加珍贵。但在平时，有关真实的记忆常常沉睡了，黯淡了，褪色了。等到谣言一起，真实的记忆从深处唤醒。唤醒一处又会连带多处，生命的重量又重新回归。

我自己，就曾一次次被谣言带出来的真实所震惊，所感动。

前面提到，爸爸在“文革”十年间天天撰文反驳谣言，其间又因眼疾由我代笔。我发现，一切善良者的反驳其实都是回忆，点点回忆连成逻辑，很快，愤怒的口气变成了动人的自述。

我毕竟懂得文学，总是向爸爸追问人情细节，祖母和妈妈又在一旁补充。结果，在那一个个风雨凄迷的夜晚，一部小小的家族史诗渐成雏形。

爸爸把这些自述的一部分，长期珍藏在抽屉里，我在他去世后找得。一页页轻翻旧纸，一次次眼湿鼻酸，觉得还应该继续做点什么。

于是，我以爸爸的自述为线索，开始了“长辈寻访”，这就是《借我一生》那本书前半部分的由来。我把这种写法称之为“记忆文学”。因为是文学，便增添了一些细节描写，改易了一些人物姓名。

书出版后，更多的长辈、亲友、同事、邻居参与了回忆。他们不断向我指出需要补充和更正的地方，但他们提供的素材，又互相矛盾，还常常与我自己的记忆不同。

因此，我再度一一拜访，细细追问，认真比勘，小心排除。结果，素材越来越多，篇幅反而越来越少，历史的筋骨出现了。因此，我把《借我一生》删改成了《我等不到了》，最后又改写为眼前这本书。有了这本书，以前的那两本只能算是草稿了，不必再出。

有趣的是，在这一过程中，我还收到了寄自浙江、福建、湖北、安徽、四川、湖南、江西等省份的诸多《余氏宗谱》，以及与余姓有关的大量考证、搜辑、名录、事迹、诗文。这使我产生一种兴奋的晕眩，一次次重新判断自己究竟属于哪一支脉。

你看，如果当初不是谣言对爸爸的反面催动，哪里会有这本书的

起点，哪里会有后来的这些篇章？

这本书的后半部分，主要写我们一代，更是由谣言激发出来的。

我甚至认为，正是二十多年一拨拨不间断的谣言进攻，帮助我完成了这本书。

因此，我要以自己的这个经历告诉年轻读者，祸福相依的古典哲学，一点不错。如果哪一天你们眼前的坏事已经坏到匪夷所思，那么，千万不要沮丧，里边一定埋藏着一个重大契机。

那么，谣言究竟是怎么帮助我写书的呢？且听我略举数例。

试想，如果没有那个有关“文革写作”的谣言铺天盖地，我怎么可能发布那个著名悬赏？我在悬赏中宣布，只要造谣者举出一个最细微的证据，例如指出我在“文革”中写过他们臆想中的一句话，一句，仅仅一句，便可立即获得全年高额薪水。这个悬赏使造谣者们产生了急迫的金钱向往，非常辛苦地查找了十几年，居然一无所获。这个结果，连我自己也十分惊讶，因为经历过十年“文革”的中国文化界很少有人经得起如此规模的查找。我为什么会这么干净？一幕幕往事渐渐浮现。于是，由长辈写了前半部分的家庭小史就由我延续下去了。此外，我受同一个谣言的刺激，写出了《四十年前》、《寻石之路》等填补历史空缺、重划历史分期的文章，受到海内外史学界的重视。

又如，如果没有那个有关“地震捐款”的谣言轰传天下，我怎么可能把自然灾害与人文灾难放在一起思考，然后从“民族大灾难”的视角来提炼我家三代经历？灾难的形成、扩大、救援、曲解，以及灾难中的牺牲、躲闪、起哄、鼓噪，成了这本书的主导线索，并由此上溯到余家远祖。作为这一谣言事件的具体起因，我个人捐建而被谣言指为“诈捐”的三个学生图书馆，一直屹立在灾区，已无须多言；但我

要感谢这个谣言把我拉回到民族命运的瓦砾废墟，使我的写作具备了概括历史的高度。

再如，如果没有那个“文史差错”的谣言奇异爆发，我怎么可能认清我们和对手之间在文化格局上的根本差别？这样的谣言貌似斯文却出自当年“文革”造反派首领的手笔，又受到当代海内外媒体的强烈追捧，我突然明白我家几十年来对付的并不仅仅是无知歹徒。中华文化的歧路选择，隐伏在打打闹闹后面。我后来的数万公里文化历险，在他们看来也都是“文史差错”，因此要用那么多谣言在阻遏。

又如，如果没有那个定期出现的“离婚”谣言，我怎么可能从他们的逻辑推断出当代文人婚姻的破碎频率？由于这种谣言的日趋污秽，我明白了造谣者们极为可悯的情感生态和猫爪挠心般的疯狂嫉妒。同时，这个谣言又使我能够更多地记述马兰父母的非凡经历，以及马兰本人作为一个纯净艺术家的坎坷传奇。

.....

总之，几乎一切谣言，对我都大有帮助。

就连那些临时涉足又快速退出的造谣者，他们一开口，也就立即开启我的一段记忆。例如，这个，是因为我在主持上海文科教授评审时否决了他的申请；那个，是因为我公开声斥了他的变相盗版行径；这个，是因为我没有推荐他担任某个职位；那个，是因为我退回了他的吹捧我的几篇长文.....

他们的骂声后面，是我内心的隐隐歌声。他们的假话后面，是我内心的历历真相。于是，我在别人无法接受的荆棘丛中，获得了真正的自在。

尤其是那位坚持二十多年而不懈的沙姓造谣者，我更要深深感谢

了。正是他的坚持，从一个连贯的侧面印证了我生命的硬度。他竟然非常天真地以为，社会上还会有人记得他几十年前被我救命又被我绝交的往事，因此不断地要用谣言来擦拭。于是，就有了他梦话滔滔的二十年，有了我不动如山而又疾步如风的二十年。

我为什么能“不动如山”，又“疾步如风”？还是要感谢他。由于他连续不断的谣言堆砌，使我成了一个疑点很多，却又谁也不知真相的“雾霭人物”。这种状态，对我来说实在太好了。“雾霭”成了一个隔离层，使我能够免除官方和民间的种种“抬爱”，不受任何干扰地写那么多书，走那么多路，研究那么多重大课题。

因此，没有他，就没有我近二十年来的文化成果，没有成熟意义上的我。当然，更没有这本书。

这，还不值得感谢吗？

由此，我体验到了很多历史人物的共同尴尬：终于发现自己的最大恩人是以仇人的面目出现的，却又找不到感谢的方式。那就只能偷偷一笑，继续接受对方的特殊恩泽。

本来这个过程还会延续下去，可惜他衰年失智，居然伪造了我妻子的离婚声明，致使“毕生谣业，毁于一旦”。这一来，我的书也就失去了反向推动，写不下去了，真是遗憾。

照理，这本书是应该写得更长一点的。

四

就这样，薄薄一本书，从“文革”的囚室写起，在父亲临终的床

头重新拾笔，一路强忍悲痛地写了下来。直到最后，为母亲写出悼词。

回想起来，围绕着全家的长久魔咒，一是造反，二是造谣，可以概括为“两造”。

“两造”，在中国古典文化中倒是一个重大词汇，因此我也不忍糟践，就把家庭魔咒转化成了生命笔墨。

我相信，无论是我们自己的年轻人还是外国人，都很难读懂里边的内容，因此想用最简单的语言介绍几句——

这本书，写了现代中国一个普通家庭三代人的历史；

这历史，虽然低微却以小见大，与通行的历史教条有根本区别；

而正是这区别，使它与生存良知有关，与文学本性有关。

癸巳春日